

主 编 黄留珠

本卷主编 贾志刚

# 西安通史

第三卷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主 编 黄留珠

本卷主编 贾志刚

# 西安通史

第三卷

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 总叙

黄留珠

## (一)

西安，周曰丰镐，秦曰咸阳，汉、唐曰长安，位于陕西省渭水盆地的中部偏南，具体经纬度为东经107度40分至109度49分和北纬33度39分至34度45分之间。从大地构造来说，渭水盆地属于鄂尔多斯台地南沿下沉地带，称作地堑。其海拔400米左右，大体东南高、西南与西北低，呈簸箕形状。

渭水盆地南为高耸的秦岭，北为莽莽的永寿梁，唯渭河流域低而平坦。渭河为黄河最大的支流，河床宽、河道多，经长期泛滥与冲击，堆积成为冲击平原，即有名的关中平原，或称八百里秦川。这里土壤肥沃，在我国最古的地理学著作《禹贡》里被列为最高等级，所谓“上上”“黄壤”。以往研究者只笼统地认为，似乎这种土地富含腐殖质，故而肥美；现经中外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深入探讨，已经基本从源头上找到了黄土形成的原因，进而为我们揭示了其自肥的奥秘<sup>[1]</sup>。在锄耕农业时代早期，这样的土地是最理想的。所以西安及周边的关中地区，很早就被称为“天府”“陆海”<sup>[2]</sup>。

[1] 说详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第二章《发生论：黄土地之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4页。

[2] “天府”作为地理名词，见于《战国策·秦策》。其中记纵横家苏秦说秦惠王一段话云：“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这里，天府所指的是秦地。《史记·留侯世家》记张良论证定都关中缘由亦云：“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这里，天府同样也是指秦地。可见“天府”最早指的就是关中平原。“陆海”，指物产富饶之地。《汉书·地理志》云：“（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颜师古注：“言其地高陆而饶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故云陆海。”这表明“陆海”一词，最早也是专指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的。

西安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13.6^{\circ}\text{C}$ 。年极端最高气温 $35\sim 41.8^{\circ}\text{C}$ ；极端最低 $-16\sim -20^{\circ}\text{C}$ 。全年以7月最热，月平均气温 $26.1\sim 26.3^{\circ}\text{C}$ ，月平均最高气温 $32^{\circ}\text{C}$ 左右；1月最冷，月平均气温 $-0.3\sim -1.3^{\circ}\text{C}$ ，月平均最低气温 $-4^{\circ}\text{C}$ 左右。年降水量平均 $507.7\sim 719.8$ 毫米，年降水日数96.6天。降水年际变化很大，多雨年和少雨年雨量最大差值可达590毫米。降水的季节分配也极不均匀，有78%的雨量集中在5~10月，其中7~9月的雨量即占全年雨量的47%，且时有暴雨出现。年平均相对湿度70%左右。年平均风速 $1.8\text{m/s}$ ，全年盛行风向为东北风。无霜期平均为219~233天。每年降雪日13.8天。<sup>[1]</sup>

西安境内的山脉，主要是南部横贯东西的秦岭。其山势巍峨壮丽，自武功以东至蓝田以西一段总称终南山（又名中南山、太乙山、地肺山、南山、秦山等）。西安适居它的怀抱之中，造成一种负山面水的形势。

秦岭在西安境内的主峰名南五台，位于西安南30多公里处。《关中胜迹图志》称“南山神秀之区，惟南五台为最”。山之清凉、文殊、舍身、灵应、观音（或名大台、大顶）五峰，因位在耀县五台山以南，故而取名南五台。

南五台东南有翠华山，距西安约23公里。山口有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修建的太乙宫，故亦名太乙山。相传太乙真人曾在此修炼。峰顶之太乙池，据说是唐天宝年间，山峰崩裂堵塞山水而成，又有龙移湫、澄源湫、太乙湫等别名。池附近有冰洞、风洞诸奇观，还有金华洞、玉案峰等名胜。

位于西安西南40余公里处秦岭北麓的圭峰山，因山峰挺拔突出如圭而得名，亦名尖山。其紫阁、大顶、凌云、罗汉等峰，皆突兀俏丽，形势险峻。北坡有落差200多米的高冠瀑布，亦一大景观。

骊山为秦岭由蓝田向西北伸出的一个支脉，位于西安东20余公里处，主峰在临潼南门外，故又名临潼山。其东西绵亘200余公里，最高峰海拔1256米，不仅是一处有着“骊山晚照”赞誉的秀丽景区，而且因其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为人们所向往；特别是山北麓以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为主体的秦文化遗存和以华清池温泉为代表的唐文化遗存，以及以五间厅、兵谏亭为代表的近现代历史文化遗存，则更使之闻名遐迩，被推向了世界。

秦岭又多山谷。这是两山间的夹道或流水道，亦即山脊间的低洼部分。秦岭北坡的山谷，凡谷口在山麓（山坡与周围平地相接部分）者称“峪”。其一般呈南北走向，南高北低。相传关中地区有秦岭七十二峪之说<sup>[2]</sup>，而在西安境内者，则有四十九峪：自东向

[1] 近若干年，西安降雪日明显有减少之势。

[2] 秦岭陕西境内北坡的峪口，远远不止“七十二”个。清人毛凤枝《南山谷口考》书中即有东起潼关西至宝鸡，“考南山谷口北向者，凡得一百五十所”之说。所谓“七十二峪”云云，当指相对著名者而言。且究竟是哪七十二峪，还有不同的版本。

西依次为蓝田县9峪——清峪，道沟峪，流峪，赛峪，辋峪，岱峪，小洋峪，大洋峪，东汤峪；长安区17峪——库峪，扯袍峪，大峪，白道峪，小峪，土门峪，蛟峪，太乙峪，康峪，石砭峪，天子峪，抱龙峪，子午峪，黄峪，沔峪，祥峪，高冠峪；户县13峪——紫阁峪，神水峪，太平峪，乌桑峪，黄柏峪，化羊峪，曲峪，潭峪，竹峪，皂峪，栗峪，涝峪，甘峪；周至县10峪——耿峪，赤峪，田峪，就峪，团标峪，黄池峪，黑峪，西骆峪，车峪，泥峪。

西安四周穿流有渭、泾、沔、涝、漓、灃、浐、灞等八条河，号称长安八水（八川），均属黄河水系。西汉文豪司马相如曾描述此八水流经上林苑情状云：“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沔）、镐（漓）、潦（涝）、漓，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向背而异态。”<sup>[1]</sup>由此似不难想见一帧八水绕长安的壮观画面。前文已经指出，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其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的鸟鼠山，东南流入陕西境横贯关中，至潼关入黄河。其他七水原本各自直接汇入渭河，后随时代变迁，浐水成为灞河的支流，漓水成为漓河的支流，漓河又成为沔水的支流。尤其是这些河流的水量，亦因气候的变化，古今差异很大。当前西安市启动八水润西安工程，旨在恢复当年八水绕长安胜景。

与河流相关的还有陂池。所谓“陂”，指自然汇集成的水塘；所谓“池”，指人工开凿的水塘。古代西安地区陂池很多，著名的如泃陂、皇子陂、周氏陂、昆明池、曲江池、龙池、龙首池、鱼藻池、海池等。今八水润西安工程建设的湿地，不少就是以古代陂池遗址为基础而修造。

北方习惯把高而平的地方叫作“原”。西安地区多这种地貌，尤以东、南两面为甚。这亦为西安自然环境的一个显著特点。随着西安建设的发展，市区的“原”差不多已被夷平，但周边远郊者仍保持着莽莽雄浑势态。兹按由内而外的顺序述其主要者如次——

**龙首原** 位于今西安市龙首村未央区、新城区和莲湖区三区交界处。唐大明宫含元殿即建其上。

**乐游原** 位于今西安市大雁塔东北部、曲江池北面。其得名于西汉，唐时为著名风景区。历代文人吟咏作品极多，尤以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句，更为家喻户晓。

**少陵原** 位于浐河、漓河之间，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杜陵、杜曲、大兆之间，汉代称鸿

[1] 《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47—2548页。关于“八水”，有人认为没有漓河，而有泃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还有人认为八水中没有漓河，而有泃河，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正确。因为古时漓河与泃河其实为同一河流，都向北汇入渭河，但后来经人工改造，漓河向西汇入沔河，又称浞河（河北也有同名河流），而漓河的分支泃河向北汇入渭河。目前，泃河起自长安区水寨村，流经长安区申店、韦曲、杜城进入西安市区，再经丈八沟、北石桥、三桥、六村堡至草滩入渭河。全长32公里，西安市区段长27.4公里。

固原。

**白鹿原** 位于灞、浐两水之间，长20余公里，南连秦岭。原面上以鲸鱼沟为界切割为南原（也叫炮里原）、北原（也叫狄寨原）。当代作家陈忠实小说《白鹿原》，即写此地的人和事。

**铜人原** 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洪庆以东，临潼区斜口以南，今名洪庆原。相传曹魏明帝欲将秦时所铸两铜人运往洛阳，至此重不可致，只得弃留原下，故得名。系骊山山前高于灞河、渭河四级阶地的台原。

**神禾原** 位于西安南15公里处，为樊川、御宿川间的高地。南起长安区王曲北江兆村，北至何家营，贾里村等地。相传原上曾产过六斤重的谷穗，故以“神禾”名之。

**细柳原** 其得名可能与汉代将军周亚夫的细柳营有关。史载汉文帝时在灞上、棘门、细柳置军防备匈奴，文帝劳军至前两处时皆“直驰入”，并受到“迎送”，但至细柳军却被阻“不得入”，后按严格的程序，成礼而去；文帝为此大发感慨，称赞细柳军的统帅周亚夫是“真将军”。细柳原位置以今西安市长安区细柳为中心，在镐京以南，沣惠和兴隆以北，郭杜以西，沣河以东。

**毕原** 位于西安西南约15公里处，又名毕陌。其境域很广，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皆葬此原上。

**凤栖原** 为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附近的高地。东接少陵原，西至勋阴坡，又名栖凤原。今西安地铁2号线设有凤栖原站。

**洪渎原** 位于渭河北岸，是渭河、泾河的分水岭，亦名咸阳原，“洪渎”之名，始于唐代。这里是由汉至唐的重要墓葬区。西汉皇帝，绝大多数都埋葬于此。2013年，在原上西安咸阳国际机场附近的邓村还发现了唐代才女上官婉儿的墓，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 （二）

西安这个地方，除了具有上述比较好的自然条件外，区位优势也相当明显，而且随着时代、形势的变易，具化为不同的内容。

首先，这里在古代是建都的最佳地。

唐代诗圣杜甫《秋兴八首》之六有句云“秦中自古帝王州”，意谓关中（确指当为西安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帝王都城的所在地。无疑，这句话并非凭空想象之辞，而是有其确切的事实依据的。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周、秦、汉、唐几代，皆在西安建都，之外，禅汉的新莽，统一的隋朝，以及分裂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也均建都于此，另，东汉末一度迁都于此，西晋亡前曾暂都于此。总计起来，截止到杜甫生

活的时代，先后有13个王朝或建都、或迁都、或暂都于西安，时间长达千余年。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杜氏才发出了“自古帝王州”的感叹。

历史上那么多的王朝，为什么如此近乎扎堆式的以西安为都？唯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西安在古代具有建都的太多优势，各个王朝权衡利弊，不能不把都城建在这里。此中，西汉王朝定都关中的经过，无疑是最典型的实例。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将国都选定在雒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是地理上的原因。原来汉开国皇帝刘邦是丰沛人（今江苏徐州北），而追随他打天下的左右大臣亦主要为山东人<sup>[1]</sup>，建都雒阳，相对靠近他们的家乡。二是心理上的原因。时人认为雒阳居天下之中，周王室自平王迁都于此之后，绵延五百余年，而秦处关中，历二世十多载即亡，因此汉君臣普遍存在一种心理：“与周室比隆”，“不如都周”<sup>[2]</sup>。然而就在此时，有一位名叫娄敬的车夫，竟大胆批评刘邦建都雒阳的错误，并献西都关中之策。娄氏本是齐人，在他赴陇西戍边路经雒阳时，通过老乡虞将军求见刘邦。应该说，娄的运气不错，贵为皇帝的刘邦还真的接见了她。

娄敬首先针对汉君臣要“与周室比隆”的心理，阐述了周、汉两代立国的不同，指出不能简单“比隆”的道理。接着便向刘邦分析了关中的地理、资源优势，以及在此建都的好处。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sup>[3]</sup>最后，他又打比方说：“夫与人斗，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sup>[4]</sup>“搯”就是“扼”的意思；“亢”即是喉咙。这就是说，在关中建都，立足于秦之故地，就好比扼住了天下的喉咙。

娄敬的这番建言，既有道理也很实际。刘邦颇为所动，但却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在群臣几乎清一色的反对声中，惟有张良支持娄敬的看法。他指出：

“（雒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束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sup>[5]</sup>大家知道，张良是西汉开国的第一谋臣，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其所长。他的分析，终使刘邦下定决心，“即日驾西都关中”<sup>[6]</sup>，并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

[1] 此系战国秦汉时期的地理概念。当时称崤山、函谷关以西为“山西”或“关西”，以东为“山东”或“关东”。

[2] 《汉书》卷四十三《刘敬传》，第2119、2121页。

[3] 《汉书》卷四十三《刘敬传》，第2120页。

[4] 《汉书》卷四十三《刘敬传》，第2120页。

[5] 《汉书》卷四十《张良传》，第2032—2033页。

[6] 《汉书》卷四十三《刘敬传》，第2121页。

刘氏。时值高帝五年（前202）夏五月。

次年，有位叫田肯的人再次向刘邦阐述了建都关中的价值和意义。田指出“秦，形胜之国也”，其河山之险，使与诸侯悬隔千里，只需两万人马，即可敌得诸侯百万之众；一旦要对诸侯用兵，“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翎水也”。刘邦听罢连连称“善”，并“赐金五百斤”作为奖赏。<sup>[1]</sup>

以上所罗列的娄敬、张良、田肯三人关于西安地区适于建都的论述，可谓经典之论。它最清楚不过地向人们阐明了西安在古代何以是建都最佳地的原因。

第二，五代以来这里一直是西部重镇。

唐王朝把我国古代社会推向了空前鼎盛，却也结束了西安建都的历史。自五代开始，因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东移、北迁，西安辉煌不再，但仍不失为中央政权掌控西北、西南地区的重镇。而且由于其千年京师的光荣经历，使之具有甚为特殊的区位优势。对此，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所撰《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十二《陕西方輿纪要·序》中曾发感慨曰：“陕西居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陕西之为陕西，固天下安危所系也，可不畏哉！”过去有人认为这是唯地理形势论，实际上顾氏所言，是对陕西这样一个四塞为固特定地区历史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其既充满感情，也不失理性，在冷兵器时代，确有相当的正确性。要之，就是说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不论作为都城，抑或作为地区重镇，均占据明显的地利。

正因为上述的原因，所以在西安的非都城时代就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即最高当局对西安地区另眼相看，给予格外的重视。其具体做法，唐以前大抵是将西安地区（习称三辅）予以政治升格，划归京畿范围，以示尊崇。如东汉便把关中与京师所在的河南尹共同算作京畿，同辖于司隶校尉部，即典型的例子。唐以后基本是慎选至亲镇守西安，以示地位特殊。例如晋武帝司马炎石函规定，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元、明两代开国皇帝，均将仅次于皇太子的儿子封王关中，等等。尤其明代，甚至连“秦王”这一封号也不轻易许人。这里有一个相当突出的实例，说的是明末原属张献忠义军的孙可望部，欲归附南明桂王朱由榔共同抗清，要求给以秦王的名义，不料桂王左右认为别的任何王号皆可，唯秦王不行。由此可见在时人心目中，秦王名号的重要与特殊。

当然，还有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建都在非西安地区的王朝，不少都曾显露出打算迁都西安的强烈愿望。如果说建武十八年（42）刘秀巡行关中滞留长达两个月，令关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sup>[2]</sup>，只是一场政治虚惊的话，那么宋太

[1] 上述田肯事见《汉书》卷一《高帝纪》，第59页。

[2] 《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98页。

祖赵匡胤誓言“终当居长安耳”<sup>[1]</sup>，则是实实在在的帝王亲口明确表态了。及南宋建立之际，迁都之议再起。当时宰相李纲建言宋高宗迁都长安，虽说没有实现，却也激起不小的政治浪花。延至明初，朱元璋又曾一度打算迁都长安。应该说，这都反映了最高当政者对古都长安的无限崇拜和向往，也是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无穷都城魅力的真切表现。

如此一种特殊情结，竟还直接延续到现代。大家知道，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武力威胁，1932年3月初，中华民国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以西安为战时陪都，定名西京，启动筹备工作。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虽然迁都重庆，但西京筹备工程并未停止，直到抗战结束方告一段落。这一史实表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西安的都城功能又曾发挥积极的作用。虽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但也足以反映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西安是理想的建都之地。一旦遇到机会，它就会登台亮相，演绎为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剧。

上述种种，如果换个角度看，岂不正好说明了自五代以来西安作为中央政权掌控西北、西南重镇地位的特殊么？而这种特殊性，也正是区位优势之所在。

第三，在当代“一带一路”建设中这里是“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

新中国建立后，西安作为西北大区最发达的城市，成为大西北发展的龙头。随着国家的发展，西安先后编制了四次城市总体规划并做了城市定位——

1953—1972年的首轮总体规划，规定以工业建设为中心，城市定位为以轻型精密机械制造和纺织为主的工业城市。1980—2000年的第二轮总体规划，以经济恢复为重点，城市定位——以轻纺、机械工业为主，科学、文教、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1995—2010年经济转型时期的第三轮总体规划，城市定位为：将西安建设成世界闻名的历史名城，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深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2008—2020年第四轮总体规划中，城市定位由“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改为“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和工业基地”，同时提出“并将逐步建设成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现代城市”的目标。2009年，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批复通过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将西安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2012年8月，西安市委、市政府启动建设西安渭北工业区。2014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在陕西设立我国第七个国家级新区——西咸新区。为此，2013年国务院批准西安市对第四轮总体规划进行修改。

回顾西安历次总体规划的城市定位，不难看出它明显是与时俱进的，而且其中历史文

[1] 《续资治通鉴》卷八《宋纪》。

化的分量不断加码。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昔日丝路起点的西安，作为整个欧亚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区位优势，在当前的“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中，西安被定位为“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如此，就把西安放到与上海、深圳同样的战略高度。这对西安而言，自然意味着巨大的机遇。

不难预料，素有浓厚长安情结和复兴汉唐盛世梦想的西安人，一定会很好把握“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机遇，将西安的区位优势予以充分发挥——其集中到一点，也就是所说的西安“一高地六中心”建设，即把西安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开放高地，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贸易中心、制造业中心、文化旅游中心、科技研发中心、金融中心、能源储运交易中心。或者用更简洁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将西安打造成中国向西开放的试验田”。

### （三）

西安的历史发展，今天来看起码可以追溯到10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时期。考古陆续发现的半坡、鱼化寨、姜寨、杨官寨等原始文化遗址，向人们揭示了西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面貌。而临潼骊山一带关于女娲的传说、蓝田华胥镇关于华胥古国的传说等，也都反映了西安远古历史的某些有价值的片断。

从文献关于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的记载来看，夏的势力已经到达西安地区。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灞桥区燎原村北发现的老牛坡遗址，表明西安地区亦存在相当可观的殷商势力。周人起家陕西，东进灭商，以丰镐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拥有天下，从而将西安历史的发展推向第一个高峰。

秦人源于东而兴于西。<sup>[1]</sup>自秦襄公始国之后，秦人即东进在岐、丰之地发展，历经穆公争霸，献、孝两代求强，商鞅变法，直到始皇平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将西安历史的发展推向第二个高峰。

西汉帝国创立了一个以“匹夫而有天下”和“布衣卿相之局”为特色的“大变局”新时代。<sup>[2]</sup>其毅然“西都关中”，定名长安，开辟沟通东西两大文明的丝绸之路，历十二帝二百余年，将西安历史的发展推向第三个高峰。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五个分裂时期的王朝，以长安为都，累计时间达百余年，西安历史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继续前进。

隋唐时期，西安历史发展迎来了第四个发展高峰。特别是唐代，则达到了顶峰。雄伟壮丽、繁荣发达的京师长安，万邦来朝、万民敬仰，尽显民族大融合结出的丰硕成果，满

[1] 说详黄留珠《秦文化二源说》，《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三期。

[2] 此用清人赵翼说。详氏著《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载经济文化交流国际大都会的历史责任，代表了东方文明的最高成就。博大包容、开放进取的唐长安气象，谱写了西安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页，同时也谱写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页。

五代以降，西安不再具有京师的地位，但却以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中央政府控驭整个西部特别是西北的中心。自五代至清亡的千年中，西安不仅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重的色彩，而且对于近现代关中文化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们所见到那些关中民风、民俗，以及精神风貌等，应该说大抵都是这千余年逐步形成的。

西安以最先响应辛亥革命、实现光复的形象而迈入民国时期。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有力地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当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西安又成为阻遏日寇西进的中心。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始终未能突破潼关天险、进入西安，实现消灭共产党、逼降国民党的战略企图，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新中国的成立，使西安获得新生，由此西安历史展开了崭新的一页。今天，勤劳智慧的西安人民锐意创新、改革进取，正在努力为把西安建设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而拼搏奋斗。一个现代、绿色、开放、和谐、人文昌盛、环境优美、蕴含巨大发展潜力、充满活力和机遇的大西安，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

以上是粗线条勾画的一个西安历史演进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总结西安历史特点的话，那么，以下的几点是需要我们格外关注的：

第一是“悠久”。前文曾指出，西安的历史起码可追溯到蓝田猿人时期。据科学探测我们知道，蓝田猿人距今约115万年。开端百万年前的西安历史，说“悠久”是其特点，应该没有过分之处。即便是西安的文明史，其肇始最迟也当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同样堪称悠久。中国城市史，能够像西安这样渊源久远者，并不多见。

第二是“辉煌”。西安历史“辉煌”的特点，是与其建都史紧密相连的。大家知道，周、秦、汉、唐是中国历史上被世人公认为辉煌的朝代，它们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极其辉煌的篇章。而这几个辉煌的王朝，均建都于西安，以西安为统治中心。所以这些王朝的辉煌，也势必与西安难解难分，成为西安的辉煌。不论是周的礼乐文明，秦汉的制度文化，抑或是唐帝国博大开放的气势、诗园艺苑的风韵，无一不是出自西安而传之全国，从而造就了令国人引以为骄傲的盛世辉煌。

第三是“融汇”。这个问题较前述两点复杂，需要稍作展开论述。

所谓“融汇”，就是融合的意思。其具体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民族融合。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融合一直都是主流，也是显著特点。以丰镐为都的周人灭商，其间就意味着商、周两族的融合。秦人自西向东的发展，实际就是不断同当地诸多戎狄部族融

合的过程，至始皇统一，则以咸阳为中心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规模空前，而西安正是这场大融合的中心舞台。此后出现的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应该说就是其前民族大融合结出的丰硕之果。特别是唐代，延祚近三百年之久，影响极其深远。陈寅恪分析唐帝国兴起原因时曾有一段精辟论述云：“李唐家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的全史，其氏族问题实为最要之关键。”<sup>[1]</sup>这里所谓“氏族”云云，说的便是民族融合。唐以后的辽、夏、金、元、清，似也应作如是观。

二是文化融合。这包括国内、国外两方面的文化融合。就国内而言，主要指地区间的文化汇融。例如秦汉时期，帝国大量迁徙关东豪富充实关中，造成关东、关中地区的文化汇融便很有典型性。史称“秦故地”，“五方杂错，风俗不纯”<sup>[2]</sup>，实际正是这种文化融合的结果。而所谓的秦故地，固然不专指西安，但西安地区无疑是其中心所在。

与国外的文化汇融，从外来的佛教中国化可以看得最清楚。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即被一步步加以中国化的改造，实际就是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最初，佛教被称作“黄老、浮屠之祠”<sup>[3]</sup>，诚如史家所言：“佛教流传，依附黄老。”<sup>[4]</sup>如此一种“依附”，就是被中国化的表现。继而，佛教在源头上又被中国化：或曰“老子入夷狄为浮屠”<sup>[5]</sup>，或曰“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sup>[6]</sup>等等。这样一来，原本是外来的佛教，乍看之下反倒成了道地的中国宗教了；佛教的创立者不是“夷狄”释迦牟尼，反倒是“中土”的老子了。及至唐代，佛教中国化的程度进一步提升到更高阶段。其标志就是佛教宗派的创立——这类佛教宗派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化佛教的派别。当时创建的佛教宗派极多，但影响最大的八派之中，十之八九创立于长安，如法相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三论宗、律宗等。可见唐长安乃佛教中国化的一大中心。应该看到，唐时京畿不惟存在佛教，而且还传入有摩尼教（明教）、祆教（拜火教）、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支派）等外来宗教。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也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交汇交融。所以，长安实际上成了中外文化汇融的圣地。当然，国际间的文化融合不只限于宗教一项，其他如国外派来的遣唐使、留学生等，也具有这样的功能。现藏于西北大学博物馆的日本留学生井真诚墓志铭，便是中日文化交流交

[1] 氏著《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页。

[2]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1642页。

[3] 《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第1082页。

[4] 吕思勉：《秦汉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34页。

[5] 《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第1082页。

[6]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9—860页。

汇有力的证据。<sup>[1]</sup>

总之，西安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文化融合，是常态的客观存在。唯其如此，才造就了周、秦、汉、唐四大高峰期长达千余年西安历史那种博大包容、恢弘深邃的气势和积极向上开放进取的风貌。这是西安历史的亮点，也是其显著特点。

第四是“落差显著”。这里所说的“落差”，具体指西安历史前期和后期的落差。从前述西安历史的发展基本线索可知，西安历史发展明显以五代为界分作前、后两期。前期历史可谓发展高峰迭起，并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起一种引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处在高峰期的西安历史，与整个中国历史是不分的，西安史即可代表中国史；换言之，就是说那时的西安历史也便是凝练的或曰精粹的中国历史。唯其如此，前期的西安历史必须要站在整个中国的高度上来书写，而不允许仅仅从地域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后期的西安历史则大大改观，只是单纯西部一个重镇的地域发展史罢了，其引领地位不复存在。如此巨大的落差，自然成为前述三特点之外的另一特点。

#### (四)

在中国的城市史上，西安戴有一顶最耀眼的桂冠，那就是“著名古都之首”。

众所周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文明古国，可以算作古都的城市很多，但真正够得上“著名”者却相对有限。大体来说，最早被冠以“著名古都”的有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四个城市，是谓四大古都。后来随着情势的发展，增加开封变成五大古都。再后来，又增加杭州变成六大古都，又增加安阳变成七大古都，又增加郑州变成八大古都，又增加大同变成九大古都。直到若干年前又出现了所谓十大古都的说法，即由原九大古都新增咸阳、沈阳、江陵、成都、银川、朝阳等城市中的一个城市而组成——这就是说十大古都存在不同的版本。<sup>[2]</sup>当然，这种著名古都膨胀的趋势，还有继续发展的可能。但不论怎么变化，西安位居著名古都之首，却始终不会改变。这是因为西安具有的以下两项硬指标所决定的。

第一，西安建都的时间最长。按照网上所公布的中国古都学会计算的八大古都的建都

[1] 该墓志是2004年春由西北大学博物馆征集得到。墓志汉白玉质，呈正方形，边长39.5厘米，厚10厘米；盖为覆斗形，青石质，边长37厘米，厚7厘米；盖顶篆书“赠尚衣奉御井府君墓志之铭”，盖志四侧均无纹饰；志面有线刻界格，志文阴刻共12行，行15字，全文共171字如下：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公姓井，字真诚，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闻道未终，□遇移舟，隙逢奔驹。以开元廿二年正月□日，乃终于官第，春秋卅六。皇上□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给】。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于万年县浐水【东】原，礼也。呜呼！素车晓引，舟旆行哀，嗟远□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人】乃天长，哀兹远方。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2] 十大古都版本的众多，反映此提法本身就存在问题，难以达成共识。这实际是各地争夺历史文化地位的非理性行为所造成的。

时间，分别为：西安1107年，北京907年，洛阳885年，开封592年，南京445年，安阳414年，郑州381年，杭州209年。很显然，建都千年以上的城市，西安是唯一的，没有任何城市可与之争锋。

第二，在西安建都的正统王朝、大一统王朝最多。还是按照网上公布的中国古都学会统计的各古都正统朝代建都多少的排名，依次为：西安七朝（周、秦、汉、西魏、北周、隋、唐），北京五朝（辽、金、元、明、清），洛阳四朝（周、汉、晋、北魏），南京四朝（晋、南朝、宋、明），开封二朝（宋、金）、安阳二朝（夏、商），郑州二朝（夏、商），杭州一朝（宋）。大一统王朝建都多少的排名为：西安五朝（西周、秦、西汉、隋、唐），北京三朝（元、明、清），洛阳二朝（东汉、西晋），南京一朝（明）。

无可否认，中国古都学会只是一个社会学术团体，它所公布的排名结果虽然具有某种权威性，但毕竟还属于参考之类，而非绝对的定谳。何况，其一些定性的提法及对各朝代的具体定位等等，也都存在可推敲之处。然而不管怎样，有了这样一个参考值对我们分析问题还是大有好处的。其实，在中国城市史上，西安坐中国古都的第一把交椅，无论怎么说都是名副其实的。

如果进一步放眼世界，可知西安在世界城市史，尤其世界古都史上也同样享有崇高的地位。人们共识，世界有四大古都。但究竟是哪四个城市，却存在两种版本。一说为中国西安，埃及开罗，希腊雅典，意大利罗马；一说为意大利罗马，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希腊雅典，中国西安。很明显，不论是哪个版本，西安均在四大古都之列。西安作为世界著名古都，当是大家公认的。

其实，在世界古都问题上需要我们换位思考。这里，似乎不必过分拘泥于数字“四”，非要所谓的“四大”不可。既然开罗和伊斯坦布尔都被列入了一种版本的四大古都，何不索性让这两个城市均言正名顺、堂而皇之地并列作为世界古都，甚至不妨变“四”为“五”，称作世界五大古都？如果这一想法尚能为大家所接受，那么在此基础上，似可以再对比一下五座古都的建城时间，来进一步解析西安在世界古都史上的地位问题。

关于五古都的建城时间，各种著作记载不一，特别是网上，说法很多，可谓鱼龙混杂，千奇百怪。因此如何进行对比，实际成为一个颇有难度的事。这里，我们拟化繁为简，采用权威工具书《辞海》的记述为准，来做这种对比，也许会更具说服力。据此，查到的西安之外的各古都建城时间如次：罗马，传说公元前753年建；雅典，约公元前8世纪建；伊斯坦布尔，始建于公元前658年；开罗，始建于公元642年。<sup>[1]</sup>

关于西安，问题稍复杂一些。《辞海》所作解释共有四条义项，其第一、三项释义的今浙江境内的“古县名”和今吉林境内的“旧市、县名”，实际与我们所说的西安无涉，

[1] 此以《辞海》2010年版为准（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八次印刷）。分见第1230、2177、2240、1009页。旧版与此略有不同。

倒是第二、四项释义“府名”“市名”同要说的西安相关。<sup>[1]</sup>所谓府名，指的是明洪武二年（1369）在西安地区置“西安府”之事（“西安”名称，即始于此）；所谓市名，则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设“西安市”之事。不论是置府还是设市，在西安城市发展史上显然都是相当晚、后的行为，而此前至少尚有近两千年的城市史。这也就是本文一开始便郑重申明的“西安，周曰丰镐，秦曰咸阳，汉、唐曰长安”那段话所表达的历史信息。对《辞海》“西安”条来说，未清晰地阐明这段历史，确为一大阙失。唯此，真正的西安建城时间，起码应该自周人选定丰镐为都城算起，迄今已经3100多年。这在五所古都之中，显然是历史最久远的。由此不难看出，西安在世界城市史及世界古都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网上提出的西安建城已有7000年历史的说法。这些论者把西安的建城时间同半坡先民的聚落遗址及户县韩村发现的崇部落遗址相联系，认为西安建城应该在已有的3100年基础上再提前4000年左右。我们相信，持此看法的网友用心是美好而可敬的，其见解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一座古城的建城史一下子提前4000年，毕竟是件大事，是需要充分论证并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目前来看，关于半坡遗址和户县韩村崇部落遗址是否已经具有建城的性质，似远未成为共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深入研究，需要更多的学术积累，需要更长的等待。也许真有那么一天，人们会用坚壁不可撼的证据来把西安的建城史向前推进几千年。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觉得现确认的3100年建城时间，已经足以显见西安的世界古都身份和地位了。

## （五）

像西安这样的著名古都，自然少不了记述其历史的文献资料。

大家知道，在《诗经》里，即有记述周文、武两王作丰建镐的诗篇，或可以看作西安历史的早期相关文献。如果说到正史，那么《史记·货殖列传》有关城市历史的介绍中，“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一段所涉及的“丰”“镐”“咸阳”“长安”相关内容，记载的便是西安历史<sup>[2]</sup>。《汉书》则设有专门的《地理志》，收集了大量的城市史资料，

[1] 此亦以2010年版《辞海》为准，见第2024页。旧版亦列4条义项，但顺序、内容均有变化。

[2] 《史记·货殖列传》相关段落原文如下：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庾、薑、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楚，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馆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其中多处论述到西安的历史，特别是关于汉“京兆尹”和“故秦地”的记载，那应是最宝贵的较系统的西安历史资料。<sup>[1]</sup>再后来出现的各种都邑志，更是以“志”书形式撰写的专门城市志。如《三秦记》《雍州记》《三辅黄图》《关中记》《西京杂记》《长安志》《雍录》《唐两京城坊考》《类编长安志》《关中胜迹图志》等等，皆是专记古都西安或与西安密切相关的“志”类重要历史文献。

近现代以来，我们与时俱进，先后出版了一批不同于传统“志”书的新式地方史、城市史的著作，但其中有关西安的，除去若干记述古迹名胜与游记类的著作外，单独的西安史却不甚见。<sup>[2]</sup>直到1959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西安历史述略》（以下简称《述略》），才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述略》作者武伯纶，著名的历史学家。该书初版时署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编”，盖当时时代使然，是时代的产物。及1979年修订再版，已经作者自我署名了。其后该书又出增订本，并多次重印。关于这部书的意义和价值，许多学者都做过评述，其中陈元方在“增订本《西安历史述略》序”中有一段论述似更具代表性。他指出：“《西安历史述略》，是解放后研究都城史的第一部专著，也是用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研究西安历史的创举。这本书的特点是：搜集的资料比较宏富，除正史外，兼收了历代文人的笔记、论文、诗词中关于古长安的材料，同时运用了许多考古发掘的新资料；对这些材料，经过条贯缕析，给人以清晰、完整和系统的历史知识；作者还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观察和研究史料，观点比较正确；叙述文笔流畅生动，条理清晰，知识系统。这是一部具有西安历史特色和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独特风格的著作，是对过去西安历史研究的初步总结。它对我们了解西安的过去和现在，对提高人民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觉悟，都是有好处的。它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有价值的

[1] 《汉书·地理志》相关段落原文，其一：京兆尹（自注：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为京兆尹）……县十二：长安（自注：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王莽曰常安）……其二：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豳，公刘处豳，大王徙郿，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彊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姦。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2] 古迹名胜类著作的代表，如1943年由西安新中国出版社推出的阎文儒《西京胜迹考》。其前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人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考》，其后195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编写的《西安胜迹志略》，亦当属于此类。关于游记类著作，如民国时期傅增湘的《游秦日录》。但这些显然不是叙述西安历史的作品。

参考材料。”<sup>[1]</sup>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符合真实情况的。

《述略》虽然篇幅不大，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基本满足了人们认识、了解西安历史的愿望和要求，受到大家的欢迎。再者，当《述略》出版后，又陆续有不少从各个角度介绍西安历史的读物面世<sup>[2]</sup>，特别是作为“古都西安”丛书之一的由众多学者集体编写的《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一书，体现了西安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其与《述略》相互交织配合，对于宣传西安、了解西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还需要看到，陕西学界、出版界相对比较重视关中地方史志的整理研究，出版有多种传统的关于长安的历史文献，供人们研究、学习之用。例如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主编的“古长安丛书”；再如三秦出版社在前者基础上新推出的“长安史蹟丛刊”，计《三辅黄图校注》《西京杂记》《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三辅决录·三辅故事·三辅旧事》《关中佚志辑注》《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游城南记校注》《类编长安志》《南山谷口考校注》《隋唐两京丛考》10种，等等。这些则从资料的层面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大家学习西安历史的需要。

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实现温饱、奔赴小康的民众对历史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高，特别是随着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会、打造一带一路“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战略目标的推进，前述的一切就显得远远不够了。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编写一部大型《西安通史》，以进一步彰显古城西安悠久的历史文化魅力，以激励广大西安市民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自豪感以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当然，除了时代、时势的需求之外，这里似还可以将目光再放宽些，从另外的层面来分析编写大型《西安通史》的重要意义。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研究中国人口密度时曾划出一条从瑗瑁到腾冲倾角约为45度的线——即所谓的胡焕庸线。线东南43.71%的国土养育着94.39%的人口；线西北52.29%的国土仅居住着5.61%的人口。如此一种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状况，自宋元迄今可以说基本没有改变。以致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参观一个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无限感慨地发出了“胡焕庸线怎么破”之问<sup>[3]</sup>。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胡焕庸线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一条人口分割线，而与气象上的降雨线、地貌区域的分割线、文化转换的分割线以及民族的界线等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这里既牵扯到自然科学自然地理等方面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民族及诸多的人文因素如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等。如果联系到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似乎不难发现，这条线也是中原王朝直接

[1] 《长安学丛书·武伯纶卷》。三秦出版社、陕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2] 主要者如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古今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王崇人《古都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武伯纶、武复兴《西安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邵友程《古都西安》（地质出版社，1983），邹宗绪《千年古都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7），刘庆柱《长安春秋》（人民出版社，1988），宴振东、姚华堤、赵海《巍巍长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等等。

[3] 李克强之问：“胡焕庸线”怎么破？人民网，2014年11月28日。